

[美] 费侠莉 著

丁文江

科学与中国新文化

[美] 费侠莉 著

丁子霖 蒋毅坚 杨昭 译
杨照明 校

丁文江
科学与中国新文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美)费侠莉著;丁子霖,
蒋毅坚,杨昭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
ISBN 7-80148-983-7

I. 丁… II. ①费…②丁…③蒋…④杨… III. 丁文江
(1887~1936) —生平事迹 IV. K82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203 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100005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 × 1 300 1/32

印张:7.875 字数:184 千

版次: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2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作者简介：

费侠莉 (Charlotte Furth 台湾译作傅乐诗) 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妇女史、文化史及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是《剑桥晚清史》的撰写人之一。主要著作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济阴：中国医疗史中的性别 (960——1665)》(*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内容简介：

本书对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独立评论》的主创人丁文江先生复杂而有代表性的经历进行了生动的介绍，并将其置于近代科学起步阶段和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充分表现了丁文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丁文江先生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而且其经历带有典型的时代特色，因此，本书并不仅仅是一部人物传记，也是一部时代的记录。

■ 丁文江	费侠莉
■ 康章合论	汪荣祖
■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李欧梵
■ 新文学的传统	夏志清
■ 寂寞中的独体	牟宗三
■ 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	卜正民
	格力高利·布鲁
■ 明代的漕运	黄仁宇
■ 国史探微	杨联陞
□ 卖橘者言	张五常
□ 黄仁宇书信集	黄仁宇
□ 黑暗的闸门	夏济安



三辉图书

策 划 人 / 严搏非
 责任编辑 / 刘 刚
 特约编辑 / 依 稀
 封面设计 / 林 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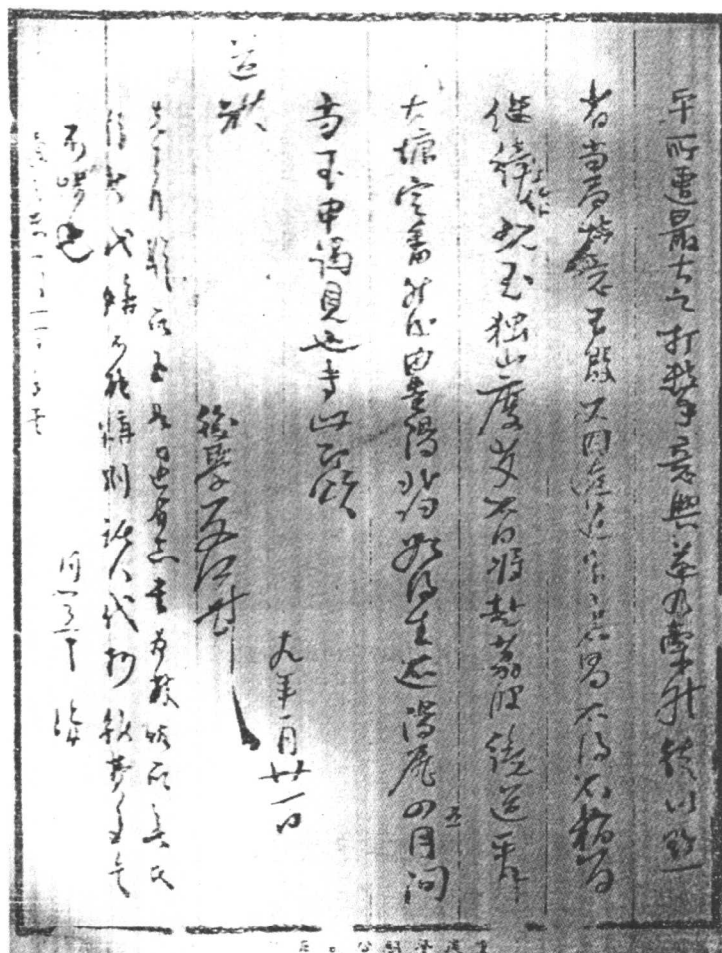


丁文江(1887—1936)遗照

红黄树草争秋色，
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
出山要比在山清。

丁文江：《麻姑桥晚眺》

于1935年12月5日



丁文江致张菊生（亦名张元济，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书之手迹

1920 年 1 月 31 日

菊生先生手序在而左陽指奉十二月六日
 書病者批集與州社志致意一切同報中妻如唐
 運兵指當各進失強片以在古園分館而之有之
 猶山州冬猶山本成反不之在生強燭告陽有友在
 遂事多備道乘有在場未及以在臨世在惟新
 竹之古堂新志者有在館而未有已也托人討購
 以一新書即報寄以別報意之以此向在相順
 知而用之是又重書其明之述臣社書乃也

该手迹由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与商务印书馆陈江先生提供

章鴻釗手書之挽聯

認責任內無處可放鬆治學然治事亦然識君
以來始信自強在不息 在君先生 千古
而後幾疑直道與偕亡 弟章鴻釗拜挽
數交游中惟真最難得能讓易能爭非易從今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北坡的丁文江墓

序

黄汲清^①

在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中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的人恐怕是很少数。中年知识分子中知道他的人多一些,但一般都把他作为反面人物看待。这是因为他曾和胡适等人一道在1920年代提倡所谓好人政府,在1930年代国难最严重期间,丁文江作为“《独立评论》派”的主将之一,倾向于支持国民党在华北的绥靖政策,特别在1926年他接受孙传芳的委派担任淞沪商埠总办一事,得不到人们的谅解。

令人惊奇的是,美国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写成了《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这本新书,厚达三百页,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对丁文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述;认为他是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她指出:“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又说:“丁文江所渴望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读了费侠莉的书,

① 黄汲清同志(1904—1995)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

我们感到丁文江作为一位爱国者、一位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一位欧化很深的思想家的形象就跃然纸上。她对丁文江的评价和过去一般的看法是多么悬殊！

本书著者参考了她所能搜集到的所有丁文江的著作、有关丁文江的传记文件和评论他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其中包括大陆上见不到的在台湾出版的材料在内，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分析、消化和选择，写成了这一有分量的著作。

本书不是一本传记，而是针对丁文江的科学成就、社会实践、学术和哲学思想以及政治见解等，采用夹叙夹议或是夹叙夹评的方式，对丁文江这个人进行比较深入的描述和刻画，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对一位和丁文江素不相识而又没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尤其难得。

在“留学生”一章中，著者引用胡适的话说，丁文江是“一位欧化最深的中国人”；又引罗素的话说，丁文江是“我在中国遇见的最有才能的人”。著者本人说：“他掌握多种语言，他那直率的讲话方式，乃至他的小胡子和对雪茄的爱好，有时使一些老派中国人感到不快，他的朋友们十分有把握地说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而那些不是他的朋友的人则痛惜他忘了本。实际上所有这些议论的真正根源在于，丁文江在英国就掌握了一个科学家的国际性专业和思维方式。”这一段文章对丁文江的评论确实是深刻的。据我个人所知，丁文江的生活方式和当时的一般大学教授没有两样。他穿长袍马褂，吃中国饭，住北京式的小四合院，绝不是什么洋气十足的人。但是，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确是“西方式的”。

第三章，“一位中国科学家长期漂泊的史诗”，是全书写得最好的部分。著者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描绘和探讨了丁文江壮年时代（1911—1925）的经历、事业和成就。文中用赞赏的口气叙述了丁文江反驳李希霍芬对中国知识分子出门必坐轿

子、从来不爬山涉水的传统说法，用自己亲身经历——攀登海拔四千多米高的牯牛寨；两次横渡金沙江深谷的探险家气概——证明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过去深受孔儒思想支配的老一代人大不相同。文章叙述了丁文江如何争取德国教授梭尔格参加他自己领导的太行山地质调查工作，从而彼此成为好朋友的经过，以及他与章鸿钊和翁文灏一道克服了种种困难创办地质调查所，培养出一批有工作能力的青年地质学家的重要成就。著者用了很大篇幅评述了丁文江 1914 年云南之行。她写道：“这次旅行是丁文江一生中最快乐的探险之一。……新一代的中国人要想把握住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接着，著者谈到丁文江如何协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立地质学系，并为它延聘了美国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和推荐了刚从英国完成学业的青年地质学家李四光来担任教授。1922 年丁文江和章鸿钊、翁文灏一道发起组织中国地质学会，吸收了当时在中国的外国地质学家为会员，从此中国人和外国朋友一道每年开会讨论学术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了中外科学家合作的中心，在地质学及其有关领域中出现了少有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文中写道：“丁文江只发表了五篇学术专著^①……但他始终抱定这样的信念：赫胥黎为了充任达尔文在英国社会的传道者也牺牲了他个人的研究。事实上丁文江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恰恰有益于开拓科学事业……他不仅为构造地质学开拓了立足点，而且为采矿工程学、生物人类学、古生物学和制图学奠定了基础。”这些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著者又说：“在 1949 年以前的岁月里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人的伟大的骄傲。地质调查所活生生地说明，只要提供适当的工作条件，中国人在科学成就上可以同西方国家

^① 这里大概指的是丁在地质学会会志上的论文。

媲美。”1936年丁文江逝世时，人们追悼他说：“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开拓者，他对促进科学和科学应用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著者继而评述了丁文江对中国采矿事业的关心，对此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并着重叙述了他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的过程（1921—1925）。文中指出：“1921年它的两口斜井年产原煤不到8000吨，而现在它已经发展到拥有两口深度分别为700英尺和100英尺的竖井，日产原煤1500吨到2400吨……这些发展的基础是丁文江奠定的。”

第四章，“中国传统与新文化”，是一个最困难的命题，然而也应当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因为书名的副题就是“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文章简短地谈到五四运动以及丁文江在这期间与梁启超等人一道，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民间代表的一些活动。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是丁文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分水岭，继而大谈丁氏的《哲嗣学与谱牒》那篇论文，从而转入优生学的讨论。谈到丁文江的道德标准时，文章引用了丁氏的话：“大众的幸福就是一切理性的人的最终道德理想。”谈到丁氏的人生观时，著者特别指出丁氏的座右铭：“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活着那样。”著者还注意到，丁氏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标准只要能够使他舒适愉快地工作足矣，再高就是奢侈。以上这些，可以说是著者归纳出来的“丁文江精神”。

书中接着论述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于朱熹时期，而梁启超则主张它起始于17世纪的经验主义考据学。丁文江赞同胡适的意见，认为考据学所用的方法是科学方法，但是丁和胡不同，认为考据学只在线装书里找问题、搞研究，不是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应该以观察、研究大自然为对象，从而推出明末的徐霞客和宋应星作为两个伟大的中国科学技术先驱。丁氏的贡献在于努力把他们的著作从

完全湮没中挽救出来，以使真正能评价他们的第一代中国人了解他们的真实成就。丁氏特别崇拜徐霞客的地理探险事迹，编辑出版了《徐霞客游记》。我曾经说丁文江是20世纪的徐霞客，这是因为徐的科学精神大大地影响了丁文江，并为丁文江所发展了。丁文江还高度赞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和他早年重点调查山西的煤铁矿和云南的锡铜矿的开采工程和矿业实况的努力是一致的。

这里我们要指出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二十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鼎盛时期。按理著者应当把它的时代背景和主要表现形式予以扼要的叙述，诸如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特别是反对孔儒思想的旧礼教以及“打倒孔家店”等进行必要的评论，然后才谈到丁文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实际上著者对这些大事基本上未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

书中评述丁文江的思想意识时，多处提到孔儒主义或孔儒思想，好像他是一个孔儒思想很重的人，这是值得商榷的。孔子提倡中庸之道；丁文江服膺达尔文主义，主张生存竞争。孔子鄙视体力劳动，出门必一车两马；丁文江则移动必须步行，登山必达顶峰。孔子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丁文江尊重女权，他和他的夫人史久元女士一向“相敬如宾”。虽然她不能生育，他从来没有想到纳妾。所以丁文江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和孔子大不相同。著者既认为丁氏是一位欧化很深的学者，而又把他放到孔儒思想体系之下，岂非自相矛盾？

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丁文江一生中的某些言行确实渊源于孔儒思想，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丁文江主张的好人政府以及他担任淞沪商埠总办一事，毋庸讳言是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孔子虽周游列邦，其道终于不行，丁文江短期从政，

也以失败告终^①，这是丁文江的悲剧！

最后简单地谈一谈著者对“科学与玄学”的论述。“科学与人生观”这一课题是由张君劢首先提出来的。他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了解欧洲的传统哲学，也熟悉中国孔儒思想以及宋明理学。他看到第一次欧战时，交战双方利用当时的科技成果，诸如飞机、大炮、潜艇等，大量杀伤人类，破坏人类文明，感到这是科学发达之害，也是物质文明之害。归根结底，西方文明极力追求工商业的发展，互相争夺市场，从而引起大战，这是科学的破产。反观中国，虽然科学不发达，但是人们满足于小农经济，没有大工商业的竞争，人民安居乐业，精神愉快。在张君劢看来好像这样的中国文明胜过西方文明。因而在精神方面，张倾向于采纳宋明理学，提倡“内省”和“良知”，以及“自身修养”。他还把科学分为物质的科学和精神的科学两大类，后者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以及心理学，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科学。他最得意的见解是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老将梁启超持有与张相似的观点。

丁文江反对宋明理学，认为科学能知世界上可知的一切；相信心理学方面和社会学方面的未来发现，一定会扩大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他还认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和推论，有什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说纯粹心理上的现象不受科学方法的支配。”这些言论对张君劢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不过后来丁文江提出了“存疑的唯心论”的见解，似乎把辩论的内容扯到别处去了，著者对此进行了批评。书中还描绘了参加辩论的最突出的人物吴稚晖、胡适和陈独秀的论点，这些论点内容虽不尽同，但他们一致倾向于反对张君劢的唯心主

^① 但丁文江担任淞沪商埠总办时花了很多的力气收回了“会审公廨”，立了一大功。

义玄学,而站在丁文江一边。参加这次辩论的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其中吴稚晖、胡适、陈独秀、任叔永、章演存、唐钺、陆志伟等站在“赛先生”一边,后两位还是心理学家,他们的言论颇有分量;而梁启超、林宰平、张东荪等则基本上站在张君勱一边。有名的科玄论战在20年代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间全面开展起来,众多的报纸杂志刊登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和报道。著者最后认为:“人们还是一致同意,科学赢得了宣传上的胜利,如果不是理解上的胜利的话。”“由这场争论所产生的对科学的热情,本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股创造性力量……”“丁文江作为一个第一流的参加者,表现出对科学的深刻理解。与胡适、吴稚晖和陈独秀等一样,成为鼓吹科学的受人欢迎的英雄人物。”

至于张君勱说,欧洲的科学发达导致人类大战,这是科学的“罪恶”。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强调四个现代化,并说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岂不是大错而特错!人类遭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年后又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残酷和毁灭程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这是张君勱来不及看到的。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不断进行战争,这种过程恐怕还要继续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历史的产物。要彻底消灭战争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丁文江先生是我的老师。对这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中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我一向表示崇敬和怀念。几年前偶然有机会看到费侠莉这部著作,感到她对丁先生的评价相当客观,且有独到见解,因而向丁先生的侄女子霖同志谈到它。子霖同志很快把它译成中文,并决定交出版社出版。我应子霖同志的请求,冒昧地写成这一序言,并藉此机会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好书。

1986年12月28日

作者的话

本书所谈的丁文江其人很难归于哪一类人物。从专业上讲,他是一位地质学家。在旧中国混乱的年代里,他或许是少数(几位)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中最著名的先驱者,然而,他又是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企业家、政论家和教育家——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北京学术界的一位领袖,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20世纪头几十年中,当中国全盘“西化”,持改良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有勃勃雄心时,丁文江为其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带来了“科学维新”的前景。此外,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孔儒思想的熏陶,因而力图根据那个传统所规定的模式,成就一位维新派科学家的事业。总之,丁文江一生事业受着两种努力的支配,而且从未顾此失彼:首先,他奋力搞清楚现代科学及其对中国旧文化秩序的影响;其次,作为念念不忘孔儒治国之道的精英,他锐意寻求有意义的行动方法。在撰写关于他的这本书时,作者执意强调的就是这些主题。

本书的前四章大部分涉及丁文江的纯科学生涯;丁文江的政治信仰和行为是最后三章的主题。这样一种安排使得我们最能看清丁文江在学术成就方面的发展过程,但却限制我们按出生年月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为了帮助读者,作者在本书的附录一中提供丁文江本人一生的大事年表,并列举当年对其本人影响最大的国家大事。